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21年报告文学：

## 向着历史和现实敞开，创造新时代红色精品

□李朝全

报告文学是与历史和时代同行的文学。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里程碑式的年份，报告文学自觉向历史和现实的深处开掘，把握时代发展大潮，聚焦国计民生和百年辉煌，推出了一批社会反响良好的优秀作品。

## 红色文学传统深厚

在百年历程中，红色文学浓墨重彩地描写和反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勠力同心，浴血奋战，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恢宏伟业，涌现出一批批风流人物、时代英雄，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生动、立体、感人的中国故事。

红色文学在100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卓越成就，从上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艺到30年代的左翼文艺、抗战文艺，再到40年代的延安文艺和十七年时期涌现的一批红色经典，包括“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等，一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改革文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红色书写”“记录小康创作”，红色文学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了几代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那些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前辈、劳动人民用汗水、鲜血与生命谱写的文学作品，它们穿越历史的时空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成为中国人民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继续滋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新时代的红色文学要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描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高扬理想、信念和信仰之旗，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奏响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用丰满的中国精神教育人民、引导人民，影响和塑造新一代的中国人。新时代的红色文学要特别注重融汇人性、人情与人文情怀，将英雄模范、奋斗中的人民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来塑造，用生动可感、感人至深的故事和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来吸引、感染和陶冶读者受众。新时代的红色文学要注重守正创新，精益求精，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从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和新时期文艺中汲取营养；要跟上时代，与人民同行，书写人民史诗，进行宏阔的艺术探索与创新，善于并敢于运用新的艺术样式来表现红色题材，赓续红色基因，增强红色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影响力和震撼力。

## “新时代纪实”成为主流

直面现实、书写时代是报告文学的优良传统。聚焦新时代，淬炼新主题，抒写波澜壮阔的新征程、人民的奋斗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主潮。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无疑是新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对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文学书写与记录必然具有非同寻常的史录价值。王宏甲的《走向乡村振兴》以贵州毕节和山东烟台等地的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典型事例，阐述大乡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凝聚起集体的力量，党和人民同心携手实现乡村振兴的故事，提出了许多富有现实意义的思考，特别是指出，在乡村振兴中应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紧紧把人民团结凝聚起来，依靠合作和集体的力量实现共同富裕和发展。这是一部立足现实、立意深远的作品。何建明的《诗在远方》聚焦闽宁协作，讲述宁夏脱贫攻坚艰苦卓绝的历程，

特别是“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通过采用“吊庄”的方式实现整体脱贫。作品同时描写了闽宁对口支援、东西协作过程中许多独特的经验和启示，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卢一萍的《扶贫志》聚焦湖南十八洞村的脱贫故事，进行解剖麻雀式的书写；蒋巍一头扎进贵州的大山里，继《国家温度》之后，写出了反映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中国大扶贫——贵州战法》。欧阳黔森的《江山如此多娇》以点带面，力图完整反映贵州全省脱贫攻坚壮丽画卷。潘灵、段爱松《独龙春风》，徐剑、李玉梅《百万大搬迁》，杨文学、杨牧原《百年沂蒙》、马步升《滚石上山：散点透视陇上脱贫攻坚》等，分别聚焦不同的老少边穷地区，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实现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的艰辛历程，为时代鏖锋前行的脚步留下了文学的印记。朱晓军的《中国农民城》讲述了温州龙港农民改革图强，40年创造出一座城市的当代传奇，展现了农村城市化的艰难历程。

反映中国科技新进展、新突破，表现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的纪实，无疑是新时代的中国好故事。龚盛辉的《中国北斗》全景式地记录北斗导航系统艰辛曲折的研发历程，巧妙运用国事家事相映照、顺境逆境平行交错的叙事方式，刻画了以孙家栋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技工作者的鲜明形象，展现了爱国报国、奋勇争先、自主创新、勇攀高峰的宝贵精神。王雄的《中国力量》和许晨、臧思佳的《深海“奋斗者”》等分别聚焦中国高铁的巨大成就和“奋斗者”号潜水器万米深潜。

抗疫主题创作陆续结出成果，为这一划时代的大事件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文学证词。纪建红的《大战“疫”》、晋宏的《生命卡点》、曾敬的《青春逆行者》、李朝全的《武汉保卫战》《隔离记》、侯国龙的《疫线突击——武汉公安战疫报告》、朱金平的《英雄之城》、韩生学的《生命大决战》、田家村的《无法阻挡的春天》等，分别从全局或局部出发，进行全景式反映或者散点透视，或者聚焦重点地域的疫情防控战，并对疫情大灾进行反思，提出警示。

生态报告备受关注。李青松的《相信自然》对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环境和生态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景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对于珍稀动植物保护主题的书写，如余艳关于丹顶鹤保护的《春天的芭蕾》、连忠诚关于国宝级珍稀保护的《大别山：一家人的朱鹮保卫战》、何建明的《德清清地流》描绘浙江德清县在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生动实践，探讨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生态建设的双赢。古岳的《源启中国》聚焦三江源区的生态和水土保持，任林举的《净土之净》、冯小军的《八步沙的故事》关注甘肃的生态保护，都是生态报告文学的佳绩。

英雄叙事是新时代纪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国家隆重表彰的时代楷模、最美人物、道德模范、改革先锋，以及七一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等，成为报告文学作家竞相采写的热门主题及对象。紫金的《大地如歌》聚焦北京恩济庄派出所已故普通民警高宝来的生平故事，讲述了一个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雷锋式的新时代警察的故事，像一盏灯照亮了居民，照亮了人心，感人至深。阮梅的《一个女孩朝前走》、李春雷的《秀儿》刻画青春陨落扶贫干部黄文秀、倾心办教育、将上千名贫困地区的女孩送出大山的张桂梅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木祥的《张桂梅，用生命点燃希望之光》和李朝德的《寻找坚守的答案》等对张桂梅进行了刻画和塑造。陈启文的《中国海水稻背后的故事》《永远的袁隆平》等作品，都是在向这位“杂交水稻之父”致敬。宋明珠的

《端水打井的人》还原铁人王进喜这个共和国历史上的英雄模范，生动传神。

## “新红色书写”应时而兴

在党和国家重大节庆之际，报告文学作家积极响应现实之需，呼应时代召唤，注重立足新时代，以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观照历史，深入挖掘各种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生动讲述红色故事，赓续红色基因，展开“正史”叙事，可被称为“新红色书写”。有些作品聚焦重大时间节点或历史转折点，描写在特定历史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以文学笔法书写年份“断代史”。譬如，徐剑《天晓——1921》讲述中共一大13位出席者曲折生动的人生传奇，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通俗而好读的国民读本；丁晓平的《红船启航》亦以中共一大的召开和新中国成立后对南湖历史遗迹的保护利用作为描写对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从浙江嘉兴的一条小小的红船开启其伟大的起点并不断走向胜利。丁晓平的《人民的胜利》以“时间开始了”为主调，着重描写了共和国创立诞生的历程。海江、凌翼撰写的《孕育》聚焦北京、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红楼为中心，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历史背景，刻画了李大钊等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形象。

有些作品则注重表现百年党史所积淀下来的宝贵历史经验和历史成就，凸显党的初心使命。铁流的《靠山》凸显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主题，表现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伊始便以人民作为自己最大的靠山和根据地，依靠人民不断取得革命的胜利：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到长征，再到陕北延安岁月，直至西柏坡进京赶考，从抗日战争全民同仇敌忾、全力支持抗战，到解放战争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将百万大军推过长江去，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确保了这场人民战争最终的胜利。唐明华的《乳娘》讲述抗战时期沂蒙山区妇女无私地为200多个八路军子女提供母乳，不惜付出巨大牺牲的动人故事，凸显了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的鱼水深情。

激情燃烧的岁月总是令人铭铭终生。赵韦的《国家至上》描写陕西火箭固体燃料研究所的历史，讲述了那些为航天提供动力的幕后工作者默默无闻的牺牲与奉献。鹤童的《热血在燃烧：大三线峥嵘岁月》聚焦当年“大三线”建设者在贵州六盘水山区度过的艰难岁月，表现他们所做出的奉献与牺牲。胡启明的《信仰——韶山中共特别支部百年历程》、谢友义以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为主角的《赤魂·赤土·赤旗》，以及钟兆云以解放后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为主角的《谷文昌之歌》，何建明以牺牲在上海街头和南京雨花台的中共党员和烈士为主角的《革命者》《雨花台》、徐锦庚以《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等为主角的《望道》等，旨在还原红色历史片段，刻画党员英雄形象，彰显信仰伟力，赓续红色血脉，都是献给建党百年的应时之作，同时也是对历史往事的深情回眸，留下了富于教育意义的革命历史读本。

## 社会问题报告发人深省

社会焦点、热点、难点、痛点都是大众关心的，对这些主题的主动反映和描写自然容易引起强烈反响。彭名燕的《用爱吻你的痛》聚焦社会救助事业，关注那些因病、因贫、因灾等陷入困境的群体，彰显传递社会大爱。杨辉素的《给流浪儿童一个家》以石家庄儿童救护中心为描写对象，讲述如何帮助流浪儿童重寻家的温暖。张一涵的

一些创作纯粹为当事人而写，为邀约方面写，而不是为读者而写，不接地气、不冒“热气”，这样的作品缺乏共情，缺乏人气。报告文学作家要聚焦新时代，用功用力反映现实，抒发人民心声，书写时代史诗，用跟上时代步伐的创作为报告文学赢得荣光。

《天下无孤》聚焦孤儿儿童的救助和脱贫，呼唤社会慈善和志愿救助精神，对于爱和善的传承都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精神性病患是当下社会一个相当普遍而严重的问题。李兰妮的《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从自身出发，从精神的痛楚和身体的疼痛出发，努力去寻找一种拯救自我的路径，最后找到了“爱”和“家”。李兰妮不仅是一名从事灵魂塑造的作家，而且是一名“带病生存”的精神障碍患者。她像一盏灯或者旷野中的一点星火，让很多抑郁症患者包括有类似精神疾病的人看到希望、看到光明，感受到温暖和力量。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精神障碍患者，李兰妮的写作具有一种“同伴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它可能比医护教育更有效。故乡的《走出心灵的地狱》是对抑郁症的调查报告，也是一份真实有据的抑郁症患者报告，意在引起公众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并伸出援手。

龚玉的《当你老了——我陪老伴的求医经历》等关注社会老龄化、关注老人特殊的生存需要。李燕燕的《我的声音，愿你回头》关注中国女性所遭遇的各种违法侵权行为，讲述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丁一鹤的《绝对控制》聚焦网络诈骗问题，杨丽萍的《舌尖下的中国外卖小哥》关注“困在网里”的快递员……这些都是重要的乃至重大的社会课题。作者们的真实反映与描写，定会引起公众的关切和深思，有助于推动相关问题的正视与解决。

## 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报告文学之所以被称为报告文学，是由于其脱胎于新闻，具备新闻性，具有同新闻采访、新闻作品相似的特征，包括资讯性、真实性、时效性、现实性等。但是它同时又是一种文学样式，因此，报告文学应该是一种新闻采访、资料文献梳理和艺术创作、艺术加工的有机统一。纯粹从历史资料、回忆录、文献档案、报道通讯等间接的、二手的“故纸堆”文字材料中去爬梳、重写或重叙历史往事，这样的作品严格来说并非报告文学。这种“二手写作”是报告文学应该反对、不应倡导的。

作为一种重要的体裁，优秀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应该是时代主题、新鲜故事和典型人物的完美展现，具备对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注及对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有效参与。优秀的报告文学同其他体裁的优秀作品相似，须注重锤炼和打磨语言文字，须精心谋篇布局，运用良好的艺术表现技巧及手法，同时须恪守真实性与思想性于一炉，具备引人、抓人、感人、动人和启人的价值。报告文学不排除合理的艺术想象和加工。优秀的作家应当具备良好的感受力、想象力、思想力和表达力，作品才能有较好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报告文学须体现针对性，它写的是“昨日之事”，但或服务作用于“今日之人”，追求史志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报告文学须遵循真实性这一底线和生命线。它通常题材新颖，具有新闻性特征，但更重要的是，它

是一种有力量的文学样式，是一种“活的文学”，应当具备人间情怀和人文关怀，有助于世道人心，是有艺术表现力、有文学感染力的一种体裁样式。

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弊端在于：多半的作品属于邀约写作和命题作文，许多作家在自己写作的惯性轨道上滑行，用自己“驾轻就熟”的手法或模式来创作，具有某种套路化写作的倾向。邀约写作本身并无对错，关键在于创作者须有足够的创作定力，要始终把握创作的主动和独立性，写出属于自己的“这一个”。还有不少作家在采访时并未深入现场，接触到具体的当事人，未曾面对面地进行深入的交谈、了解和调查，而常常止步于邀约方所提供的新闻报道、宣传材料、工作总结等，从这些材料出发进行文学加工，这是一种省事、省力、省心的做法，也是报告文学的一种惰性写作。

在写作上，不少作家“躺平”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以自己采访的时间顺序，用移步换景式的采访口述实录，直接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为线索谋篇布局。这也是一种讨巧、省力的写法，但这种写法难免有流水账之嫌，其代入感、艺术性等都可能存在很大的疑问。

还有一些作家因为接受邀约写命题作文，在创作上缺乏自主性，对作品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升，往往止步于单向度的“颂体报告”，乃至沦为宣传品、表扬稿而丧失了文学性和艺术性。此类作品或被讥为“广告作品”，但其发表时却冠冕堂皇地打着“报告文学”的幌子，因而常常为人所诟病，极大地败坏了报告文学的名声。更严重的，正是由于泥沙俱下，大量伪装的“报告文学”或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和感染力的作品的存在，让“报告文学”日益受到非议乃至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二等文学，沦为一种不受人待见的体裁。这些作品大多过于注重正面宣传而缺乏艺术技巧，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和感染力的作品的存在，让“报告文学”日益受到非议乃至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二等文学，沦为一种不受人待见的体裁。这些作品大多过于注重正面宣传而缺乏艺术技巧，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和感染力的作品的存在，让“报告文学”日益受到非议乃至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二等文学，沦为一种不受人待见的体裁。

当下报告文学参与现实的能力明显削弱。一方面是由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作品数量大幅度减少，反映社会问题、聚焦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作品往往能够有力地参与现实，也容易受到读者关注和好评，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多半作家都忙于邀约写作，加上揭示问题存在较大风险，因此问题报告方面的作品数量较少。另一方面，不少作家在创作时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缺乏直面读者、直面社会的自觉，一些创作纯粹为当事人而写，为邀约方面写，而不是为读者而写，不接地气、不冒“热气”，这样的作品缺乏共情，缺乏人气。

躬逢伟大的时代，与时代和人民同行的报告文学是能够产生大作为力的。报告文学作家要聚焦新时代，用功用力反映现实，抒发人民心声，书写时代史诗，用跟上时代步伐的创作为报告文学赢得荣光。

## ■第一感受

## 清新可喜，如沐春风

——读《张战的诗》 □远 洋

张战的诗率性而为，诗思灵动活泼，常常出人意料。她的诗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受，充满人间烟火味，吃火锅、烧半只麻鸭、喝鹅汤都可以激起灵感，成为诗的题材；遑论亲情、友情，自然风物和社会现实，俯拾皆是诗，入眼万般美，都写得朴素而真挚。在她的笔下，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勺等庸常事物仿佛被施了魔法，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啧啧称奇。

书中多首写父母的诗，《我的母亲今天很美丽》别出心裁，打破了一般写母亲这类诗歌的“悲情”套路，一股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全诗的语调亲切感人，节奏明快，如小姑娘在妈妈跟前跳着春天的舞蹈，“只有盛开的榆叶李配做她的姐妹/榆叶李盛开/我母亲白发明亮/榆叶李如烟似幻/我母亲一生轻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开花的榆叶李树下，这是怎样一幅美好的画面！写父亲的诗数量更多，却并不像写母亲那么甜美、欢快和轻盈，而是有着苦涩的味道、迟缓的节奏和凝重的色彩。《泡桐花》里写到，“满城泡桐花是我父亲每个春天醒来/吹奏起一支中音号”，结尾是“泡桐花开得空空”，类似于曲终人散的惆怅；《我从未亲吻过我的父亲》，书写了深深埋藏在心底的永难弥补的内疚和隐痛；在《七月半，我接父亲回家》里，诗人穿越数十年时空，信手拈取了“鞭炮声里他冲入队伍/高呼着把我举过头顶”、“深夜给鱼苗布草”、“月光一夜漂白他的头发”等几个画面，类似于电影蒙太奇手法，串联起对父亲一生的回忆，寄托了深沉的哀思；《西藏十章》采取大开大合的结构方式，穿插了诸多生动鲜明的细节，把对父亲的怀念置入天堂般广袤高远的背景，从哲学和宗教的层面来思索生死爱欲、幸福和灵魂等等问题，使死亡显得悲壮、庄严而又神圣，进而呈现对有情众生的悲悯。从中可以看出，诗人有一颗柔软、温暖的心。

诗人热爱大自然，并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我在

哪里》，“整天在树林里游荡”，“像一个兴奋的小姑娘”，听见“杜鹃凄凉地喊/哥哥等等”，如果说“你没有从树上采摘过苹果/没有用竹枝把扑捉过树叶/你分辨不出树叶不同的味道”是写诗人对未曾亲近自然、“不劳而获”的内疚，接下来的诗句却直面人与自然的疏离真相：“死后也不会有块土地把你安葬/不会有一棵松树穿过你的身体/高高为你撑一把绿伞”，我们现代人，活着时远离自然，违背自然，死后也不能回归自然的怀抱，得不到自然的庇护，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命运和结局。在另一首诗《仿佛一阵疼痛的击打》里，“松树香味突然袭来/仿佛一阵疼痛的击打”，诗人的心灵有多么敏感啊，几乎到了脆弱的程度，竟然无法承受松树的香味！显然，这是勾起了久久远离大自然甚或人类曾经戕害大自然的隐痛，也包含着对大自然母亲感恩之情；在诗人听来，“一只鸟叫的声音/像一个孩子呜咽的喉咙/松针落在脸上/是一个轻吻”，对动植物不仅充满同情，还洋溢着亲密的感情。在这里，诗人没有人类居高临下主宰万物的姿态，而是将自己放到与动植物同等的地位，或者说，把动植物放到与人类同等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

诗人将悲悯的目光投向芸芸众生。《阿尔泰山晚霞》里，“怀孕的母羊走得慢/一只小羊跪下了前蹄/牧人呼吸粗重/他听见了小羊的哀鸣”，进而追问“为着远方那一口水草/是谁驱赶着我们的命运”。在《洞庭四短章》里，“苇莺细腰身/解

自己的孩子/也解杜鹃的孩子”，“杜鹃的孩子一出壳/就把苇莺的孩子推到巢外面去了/苇莺喂着杜鹃的孩子/一如喂着自己的孩子”，简洁的白描，寥寥几句，既令人感叹母爱的伟大和盲目，也让人为这种无差别的、博大的爱而深深感动。我愿意将《瀑》看作是对女性个体与群体性格的描摹、命运的缩写，“瀑布是一个女人/有你想象不到的力量”，那种力量是义无反顾，是奋不顾身，是宁肯玉碎也不能瓦全的决绝；而在《在沱江与长江交汇处》一诗中，“水总是你挤我，我挤你”，“柔软如虚无的江水/无处不是伤口/无处不是缝隙/无处不在愈合”，揭示了某种群体中人与人之间互相依存又互相伤害的微妙关系。

《陌生人》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诗。“这是我的厨房/这是我的餐桌/陌生人/我请你坐下/坐在这张老榆木桌旁/抽着烟/安心地等/我为你做一顿晚饭”，平平常常、实实在在的话语，将主人“我”的善良和怜悯之心表露无遗；“老榆木桌”这样的古朴耐久之物，暗示了主人的朴实厚道，值得信赖和古道热肠；其温柔亲切、迟缓稳重的语调，想必也能让“陌生人”放下心来，安下心来，耐心等待，接受好心人的款待。“我”抑制着自己的好奇，“我不问你从哪里来/我不问你你心里的恐惧/像河沙藏在深海底/我不问你你为何忘了自己姓名/为何会敲了我的门”，“陌生人”是失业游民，还是职业乞丐？是穷困潦倒的流浪汉？还是逃脱追捕的罪犯？“我”一概不管不问，也许“陌生人”会

给“我”带来危险，会对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构成威胁，“我”当然害怕，却藏起了自己的害怕，为“陌生人”敞开家门，精心烹调食物，让“陌生人”享受一顿美味的晚餐，“你吃/你喝然后你走”“继续你踉跄的脚步”，透露出悲悯众生的精神世界。

张战的诗歌语言不事雕琢，生动流畅。许多诗有民歌风，又融入了现代诗的象征化表现手法，采用浅近的口吻却不直白；有些诗像水墨画，笔致简约，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沅江》一诗，似乎深得沈从文和汪曾祺或者废名的妙处，一般写诗时忌讳的形容词，在这里都显得那么妥贴，那么高超，整首诗含蓄蕴藉，意境朦胧而深远。乡野的美，爱的感伤，风俗人情的淳朴，种种人生的况味，尽在不言之中。《夜》也同样具有“留白”之美，“小蟹轻如影/沙滩上有神秘足迹/缝衣针一样/深/直/细”，深得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趣。这些诗也再次证明，诗歌和音乐、绘画一样，属于艺术的范畴，而且诗歌是综合性艺术，它吸收并融合了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多种表现技巧。《云与男孩》《吃梦的女人》等写得像童话和寓言，《女友们醉了》《两株松柏》等娴熟运用戏剧化的叙事手段，《买》写了现代人的城市病，《孤独的鞋》想象一个热爱生活的现代人与庄子的一场对话，这些都显示了诗人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下笔通透而又活脱。

好诗出自灵性，出自鲜活的生命体验；好诗能刷新语言，刷新读者的审美眼光。相对于那些仍旧“主题先行”演绎所谓思想观念的概念化的诗，那些象牙塔里故弄玄虚、炫耀雕虫小技、搞文字游戏的诗，那些无聊呻吟、堆砌辞藻、刻意雕琢的诗，我当然更喜欢这样质朴自然、因为它来自于大地，来自于日常生活，来自于真情实感，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一个既有灵性又有丰富生命体验的诗人，读着觉得清新可喜，明亮温暖，如沐三月春风。